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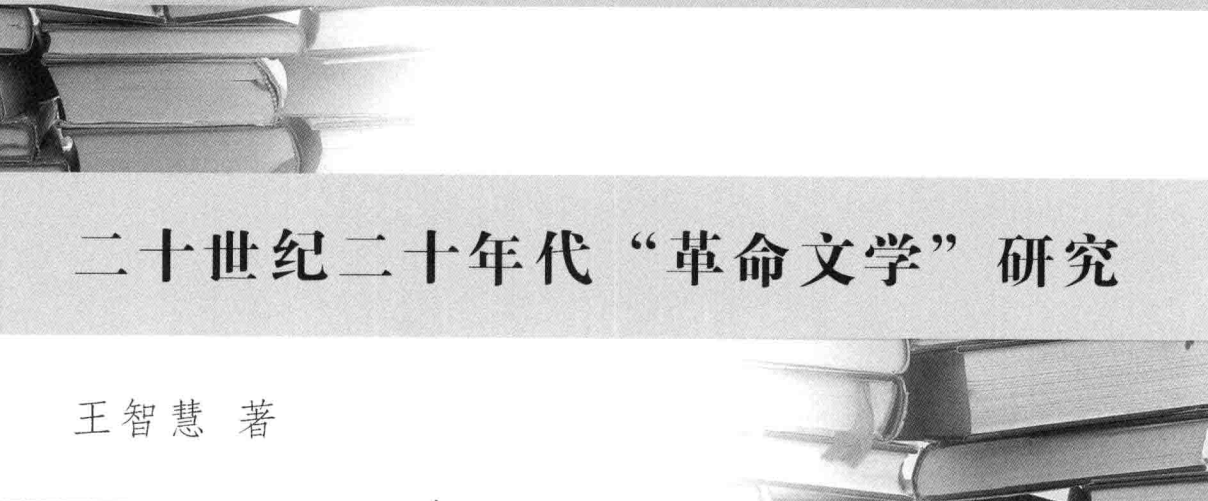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文学”研究

王智慧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文学”研究

王智慧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文学”研究/王智慧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61-2947-0

I. ①二…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革命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585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 彬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258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这是王智慧写于十多年前的博士论文，2002 年通过答辩。

以北大教授温儒敏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认可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指出“其学术建树主要有三点：一、清晰地勾勒出 20 世纪 20 年代‘革命文学’的发展历程、历史背景及理论源头。二、敏锐地发现并深入分析了‘革命文学’的流行性特质、‘革命文学’实践对理论设定的背离与超越等重要问题，有独到而令人信服的见解。三、对‘革命文学’的历史贡献与存在的问题也有全面的概括与准确的分析”。——从普遍的情况看，那时的博士论文答辩比现今认真些、严格些。

几天前，王智慧对我说，重读了一遍论文后感慨：现在写不出来了。我也感慨：是啊，十多年过去了。

已经想不起来论文题目是怎样确定的，但可以肯定：选题出自王智慧本人。

想当年，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可选的题目太多——是占了第一届的便宜。到了 20 年后王智慧做博士论文时，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被称为成熟的学科或者拥挤的学科，很多选题都有不少人做过了。

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在论文评议书中写道：“关于现代文学史上的革命文学，近十几年几乎被学术界遗忘了，即使提到它，也总是被当做挞伐的对象。这是有违历史主义的新偏见。就此而言，本论文作者在论文选题上是颇有‘反潮流’的学术勇气的，同时论文作者选取‘左联’之前的革命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是颇有学术眼光的，因为这一时期的革命文学是研究最不充分的一段。”解教授写于 2002 年的这段话说的是当时的情况，其后几年，革命文学的研究曾经形成一定热度。

一个博士生，一个研究者，她研究这一文学现象而不去研究另一文学现象，她研究这一段文学历史而不去研究另一段文学历史，她研究这个作

家而不去研究其他作家，研究对象的选择已经包含多种个性因素。

论文中有这样的文字：“对青年人来说，还有什么东西能比爱情和作为事业的革命更重要，也更具魅力？”我揣想：王智慧选择曾被以“革命+恋爱”概括的革命文学做论文选题，是否包含着理解自己未曾经历过的另一样青春、另一样人生的渴望？处于不同时代不同位置的人生境遇，很难强拉来做比较，而她的论文写作过程渗入了自己青春与另一样青春的碰撞。

有人在强调文学研究的学术性时，将其解释为客观性、科学性。对此，我有疑惑。我始终觉得文学论文与其他学科论文有所不同，写作中是否有精神和感情的投入是不一样的。

人生要经历很多事情。写作博士论文只是王智慧的一段经历、一段人生。读博三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混三年弄个学位的大有人在。那时候，一套论文写作模式已经形成：从西方著作的汉译本中寻找理论依据和批评参照，而后选取中国作家作品做一番演练，并将其中与考察角度相适合的内容聚焦放大。论文可以写得容易，也可能写得艰苦。王智慧三年间专注于读书、思考与写作，专注于她所选定的论题。我的导师唐弢先生说过：“一个学者只要能专注于某个问题10年，就能成为这一方面的专家。”王智慧专注于革命文学的研究仅三年，她的成果即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文学”研究》。之后，她任教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工作兴趣随职业而转换。

王智慧的父母为她取名“智慧”，寄予怎样的期望？一位只见过智慧两三次的朋友对我说她像有慧根的人。佛语的慧根指照破一切、生出善法的智慧。王智慧并非聪明人——在中国知识界，“聪明”已被涂上小精明、小算计之类的贬义。她无城府、无心机，性情真率。作为文学专业的博士生，由于少年时代的阅读量不足，王智慧的学术准备并不充分，但她以三年间不懈怠、不取巧的努力，写出了兼具扎实和锐气的学位论文。

与所有博士生及研究者一样，王智慧的论文准备工作从阅读开始。我对文学研究工作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环节——阅读，如今被一些人称作“查资料”最难理解。记得我做硕士生时，唐弢老师要求我们至少用一年时间阅读旧报刊。翻阅那些已经发黄变脆的书页，仿佛被引导着穿越时空隧道，进入自己出生前的时代。我非常喜欢西川写于1986年的诗《读1926年的旧杂志》：“一页页翻过，疏散的枪声/远远越过枯竭的河流/发黄的广告竟魅力无穷/我无忧无虑地看那纸上的/夕阳陨落。我应该/回到那个时

代，倾囊而出/买一支钢笔，或/一架嘎嘎响的风车。”从容的节奏里垂吊下历史的长影，萦绕着难以言传的深远感。我曾与王智慧交谈过读西川这首诗的感受，而她所阅读的旧杂志恰恰包括1926年出版的。阅读期刊的感性体验无法以读选本替代。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文学”研究》涉及的时间范围为1923—1930年。论文力求全面——当时还少有全面论述这一时期革命文学的著作。第一章“革命文学概说”以“胎动期”、“始兴期”、“高涨期”分阶段叙述革命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发展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词。“发展”涉及过程，而对过程的梳理似易实难。从第三章起，王智慧论述了革命文学所蕴含的一系列问题：文学与政治、理论与创作实践、宣言与策略、革命与恋爱、个人与集体、创作自由与集团规诫、同人团体与宗派主义、革命文学的题材优势和流行特质，等等。这些问题当然还有待更深入地展开，其意义并不限于论文所研究的文学现象，甚至不限于文学领域。

王智慧写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如同永恒的斯芬克司之谜，困惑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代又一代作家。”她的论文所论及的所有问题都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派生出来——“革命文学”的命名本身既包含政治，又包含文学，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例如第三章第二节“个人与集体关系考辨”中的“在创作自由与集团规诫之间”辨析了的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作家在选择革命和持守自我间的矛盾挣扎：“由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其间绝非一帆风顺的通途，而是充满血泪和艰难的苦辛。”文学写作的个人性质天然地排斥集体性，但当作家本人加入了集体——集团、社团或党派，他又不能不受着集体的约束。加入集体既为本人自愿的选择，意味着加入者情愿放弃自己的一部分自由。研究者通常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对立起来，但以“自由”的本义衡量，革命作家未必缺少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他们甚至可能比自由主义作家更热爱自由。热爱自由者敏锐地感受着社会对个人自由全方位的压制，不甘于按照社会既有秩序安排和度过人生，对自由的渴望化为愤怒和反抗。一个人势孤力单，怎么反抗？当他们看到某个组织正从事以自由为旗帜为号召的斗争，他们一厢情愿地去投奔、去报效。五四以后走向集体主义、朝向左翼的作家往往是怀着对自由的热烈憧憬才做出这样的政治选择。而在他们投奔了组织后，组织则要求他们牺牲自由——这牺牲是有承诺做底垫的：为了将来的自由而牺牲

当下的自由；为了大多数人的自由而牺牲个人的自由。左翼诗人殷夫将裴多菲诗译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诗中的“自由”几乎与革命同义。与此同时，发轫于某种政治意识与集团意识的作品，也可能蕴含具有普泛意义的人性内容。——这是我重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文学”研究》，受其启示引发的一点感想。

刘 纳

2013 年 3 月

引言

何为“革命文学”？

这是我撰写本书时首先遭遇的一个问题。

面对这一问题，我感到些许尴尬与困惑，这源于心中对“革命文学”这一研究对象那份不言自明的感觉。这种感觉曾多次劝诱我将之视为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而予以忽略。但学术研究须得拒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对“革命文学”的实在界定似乎成了写作本书不可逃脱的宿命。我知道，任何界定，都是一种删繁就简的有限化、凝固化过程，无限的丰富与复杂往往只能跃动于潜层、内里。这样一来，简单的界定行为本身与内涵的丰富性之间难免就构成一种紧张与冲突。而这，正是我对界定“革命文学”所感到犯难的主要原因。

“革命文学”的口号提出以后，尽管当时不同的人对这一概念内涵与特征都曾有过不同的理解（关于这点，本书第一章第一节中会有所述及），但其中总有些本质性的东西是共通的。也正是在此基础之上，“革命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才会渐渐兴盛、壮大起来，最终形成有名的革命文学运动。下面就我理解的“革命文学”这一概念内涵作一简单描述。

我所说的“革命文学”，是指“左联”成立之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兼受国外“左”倾思潮的影响，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具有一定煽动性的激进、革命的文学形态。其理论倡导者与创作实践者主要还是一批革命倾向鲜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太阳社、后期创造社为主，此外还有我们社、引擎社、白华社、流荧社等文学社团以及一些“既没有结社来标榜，又无名人做靠山”^①的青年著作者。由于受实践经验与认识水平的限制，他们常常表露出一些错误的思想倾

^① 胡也频：《写在〈诗稿〉前面》，《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27号，1928年9月18日。

向，艺术上也相对幼稚、粗糙。因此，“革命文学”还只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初期发展形态，但它确为“左联”成立后声势浩大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打下了较为稳固的基础。这股文艺思潮在“五四”落潮后的1923年前后开始酝酿，到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达至高潮。

当时就有人提出：“革命文学是含有革命性的文学，但是内容很广泛的，含混的。究竟是怎样一种革命，又怎样才是革命文学，都没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很容易发生许多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见解。”^① 所以，同时存在的还有“新兴文学”、“普罗文学”等称谓。所谓“新兴文学”，是相对于“旧文学”而言的。“革命文学”的提倡者把之前的“五四”文学看作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因而是“旧文学”；而自己所从事的文学则与之截然不同，即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无产阶级文学，因而是“新兴文学”。其实，这种称谓也含混不堪，充其量也只是模糊地表明了它与先前文学的不同，至于“新兴文学”的本质何在，它并没有把握到位，至少在这一概念中没有凸显出来。再一个概念就是“普罗文学”。“普罗”即“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t的音译，即无产阶级），“普罗文学”，就是无产阶级文学。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避免国民党当局注意而采用的名称。虽然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学，但由于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以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文学还是有所不同。这段历史时期，正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生、初创期，与我们所界定的“革命文学”时期相近，故以“普罗文学”来指代“革命文学”也可以，而且还把“革命文学”这一宽泛的概念锁定在“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的范畴之内。由以上对“普罗文学”的界定，就可以看出“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的明朗关系。无产阶级文学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其内涵可由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六七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革命文学”则仅指20世纪20年代（约1923—1930年）的无产阶级文学，它只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初期发展形态而已。既然是初始形态，其幼稚、粗糙也就在所难免。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② “革命文学”就提供了这样一些“新的东西”。日本作家德永直曾说：“在漫长的一千年间，在

① 何大白（郑伯奇）：《中国新兴文学的意义》，《大众文艺》1930年第2卷第3期。

②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页。

日本文学史上未曾有过被压迫阶级的文学，当然更没有具有阶级觉悟的被压迫阶级的文学史了。我们是在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觉醒，在日本的先觉的革命艺术家们的斗争历史教导下，第一次走进日本文学史的。”^① 仅此一点，就足以确立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历史上的地位。中国作家阳翰笙在评价早期无产阶级文学时也有过类似表达，他说：“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但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只有地主阶级，奴隶主的文学，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学。民间文学也是一脉相承，不绝如缕，但未能登大雅之堂。而普罗文学的产生，工人、农民成为文学作品正面描写的形象，工农群众变革世界的斗争成为文学作品的题材。全新的气派，全新的时代精神，中国文学进入新的历史阶段。”^② 于稚嫩粗陋中闪发着执拗的拓荒精神，这就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革命文学”。正如当时某个刊物所标榜的，“我们是幼稚的，但却是前进的；我们是薄弱的，但却是奋斗着的；我们的处境是饥寒交迫，营养不良的；但却是不屈不挠，不断地在向着黑暗方面下总攻击的。”^③ 用这段话来描述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的“革命文学”，也是十分精当的。

有学者曾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如果采用一种高度概括的说法，实际是由两个关键性的文学运动产生的文学的历史。首先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其次便是中国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它是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基础上发生的，但却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改变了‘五四’新文学的固有流向，使它向着不完全相同的方向流动和发展了。”^④ 而 20 世纪 20 年代的“革命文学”，正是左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初步形成期与发展源头。由于左翼文学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后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所以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现象、命题都可以从作为左翼文学胎儿期的“革命文学”中寻找印痕。因而，对“革命文学”的研究，同对“五四”文学革命的研究一样，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化研究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相对于“五四”文学研究的繁复、细致，研究成果的卷帙浩繁，“革命文学”研究领地则荒僻、冷寂得多。我撰写本书的目

① 德永直：《关于〈没有太阳的街〉的一些说明》，《没有太阳的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07—408 页。

② 阳翰笙：《〈两个女性〉小序》，《两个女性》，花山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 页。

③ 《我们》第 1 期“编后”，1928 年 5 月 20 日。

④ 杨占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序》，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

的，就是希望能够真正走入“革命文学”这既已远去又时时隐显后世的独特文学现象，对其丰富性、复杂性有一份自己的认识与把握，并寻找过去与现在的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我们“并非只从已经消逝了的生活的知识中寻求满足一种知识欲，而是寻求某种精神的充实或吸取某种教训”^①。本书采用宏观/微观的双重论述模式，对“革命文学”既有整体性观察、全景式透视，也有择取几“点”的集中突入。本书以“革命文学”为研究轴心，辐射考察其作家、作品与刊物，它赖以留存的社会基础与美学特质，它的理论主张与实际创作之间的差距，它与外国文学的关联，它的艺术得失及其所昭示的经验与教训，等等。

^① 雷蒙·阿隆：《历史哲学》，《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目 录

序	刘 纳 (1)
引言	(1)
第一章 “革命文学”概说	(1)
第一节 缘起与发展	(1)
第二节 代表性社团及作家、作品	(25)
第二章 “革命文学”理论探源	(47)
第一节 “革命文学”与苏、日文学交流概述	(47)
第二节 日本文艺理论的影响	(56)
第三节 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	(72)
第三章 “革命文学”实践对理论预设的突破	(83)
第一节 假托大众之口的文学虚拟	(83)
第二节 个人与集体关系考辨	(100)
第三节 “革命文学”艺术得失论	(118)
第四章 “革命文学”的流行特质	(138)
第一节 时代之流与作家之舟	(138)
第二节 “革命+恋爱”的题材优势	(145)
第三节 隐含流行态势的艺术素质	(160)
第五章 个案实绩考察:以蒋光慈为例	(172)
第一节 蒋光慈创作概略	(172)

第二节 《田野的风》与《毁灭》、《铁流》比较	(181)
第六章 “革命文学”所提示的理论问题	(203)
第一节 文学与政治	(203)
第二节 同人团体与宗派主义	(213)
参考文献	(224)
后记	(231)

第一章 “革命文学”概说

第一节 缘起与发展

在后期创造社成员李初梨与太阳社成员钱杏邨之间，曾发生过一次不大不小的争论，即被文学史家称作“争夺革命文学发明权”的插曲。其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1928年初，蒋光慈在《太阳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其中他说道“革命的步骤实在太快了”，这往往使得作家“追赶不上”。不久，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2号上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对蒋光慈的上述说法提出了质疑。并且，该文开篇还有这样几句话：

一九二六年四月，郭沫若氏曾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革命与文学》的论文。据我所知道，这是中国文坛上首先倡导革命文学的第一声。

接着，钱杏邨著文《关于“现代中国文学”》^①，首先对蒋光慈的原意加以阐释，认为李初梨的质疑是对蒋文的“一种误解”。并针对李认为郭沫若的论文是“中国文坛上首先倡导革命文学的第一声”这点，提出了不同意见：

据我所知道的，革命文学的提倡并不起源于这时；在《新青年》

^① 钱杏邨：《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太阳月刊》1928年第3期。

上光慈就发表过一篇《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在一九二五年在《觉悟》“新年号”上就发表过《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并且在一九二四年办过一个《春雷周刊》，专门提倡革命文学。又他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所写的革命歌集《新梦》和小说集《少年漂泊者》，在一九二五年也就先后发行了。……

随后，李初梨又在《文化批判》第3号上发表《一封公开信的回答》，称“我们始终是把‘太阳’认作自己的同志”，并在文末郑重声明：“最后，希望钱先生仍能承认我这篇文章，对于你及‘太阳’诸君，是没有丝毫的恶意。……”至此，这场论争才趋于平静。

这场瞬时掀起又很快平息的论争，却激起了当时及后世文学史家对“革命文学发明权”的热切关注。

1928年8月，青见在《语丝》上发表《关于革命文学》，其中提供了“一点考据”：早在1922年3月赵景深等编的《微波》第一集中，就有人提到：“中国此时最缺少的即是革命文学，一切宣传品，不是失却文学价值，即是没有革命的色彩，我们有志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最希望趋于革命文学……我们现在急需的文学，即是革命文学，去盼望文学界的，也是革命文学家。”所以他说：“一般现在所谓革命文学家者，不要太自豪，再纷争发明权，要知道早已有人提过了。”^① 现在有学者也对此种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实际上，‘革命文学’也不是《微波》最早提出的。因为，还在1921年7月，人生派的理论家西谛就已在《文学与革命》等文章中指出：为了完成文学革命必定得有革命文学的出现”^②。有的学者已较全面地认识到，“革命文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形成过程。但在梳理“革命文学”发展脉络时依然强调：“1924年5月17日，恽代英在与王秋心的通信《文学与革命》（载《中国青年》第31期）中，第一次提出‘革命文学’、‘革命的文学’的概念。”^③

人们或片面强调“革命文学”这一名称的第一次提出，或因对“革命文学”这一概念内涵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所以才会在“发明权”问题上

① 青见：《关于革命文学》，《语丝》1928年第4卷第33期。

② 施建伟：《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

③ 张大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革命文学》（上），《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3期。

产生那么大的分歧。这种甚至连逻辑起点都不同的论争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但它却牵出了一个十分有意义的问题：即“革命文学”的缘起及其发展脉络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这个问题吸引着我对此作一探索与梳理。

如同海洋中漂浮的冰山，显露而出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更大的根部却隐藏于海底深层。“革命文学”并非一般文学史所描述的那样，好像只是1928年前后那段特殊的文学存在。它实是时代之流激荡下由各方人事共同促成的一个积累已久且不断发展的文学形态。当年反对提倡“革命文学”的“语丝”派成员韩侍桁在1928年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创造社倾向于无产阶级文学，想把革命与文学结婚，明面看着虽然是从今年的新正开始，但仔细地考察起来，却绝不是突然的，他们之所以在今日发酵了，也实是经了很长时期的酝酿。”^① 这种说法其实是很有见地的。“革命文学”自最初的“酝酿”到后来的“发酵”、高涨，几乎历经了整个的20年代。综观“革命文学”的发展历程，我认为，大致可以将它分作三个时期进行考察，即：

（一）1923年前后至1925年“五卅”，为“革命文学”的胎动期。

（二）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为“革命文学”的始兴期。

（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30年“左联”成立，为“革命文学”的高涨期。^②

一 “革命文学”胎动期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狂飙突进的文学革命浪潮已低落下来，中国文坛一片寂寥。反对封建主义，追求个性解放、婚恋自主的呼声已嘶哑微弱，不再能够动人心弦，而像鲁迅《呐喊》式的直勇进取之作也鲜乏可陈。“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是对当时文坛情状的绝佳形容。早期共产党人也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文坛的这种贫乏病症，他们指出：“文学革命和两性观念解放之末流，使一般青年渐流于以文学和恋爱为生活的中心，而消失其奋斗进取之精神。”^③ 这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是极不协调的。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劳工运动和继之而

^① 侍桁：《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语丝》1928年第4卷第19期。

^② 虽然我们不喜欢以政治事件来对文学史作出阶段性划分，但有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确对文学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五卅”运动、大革命的失败等就都是这样的历史事件。

^③ 林根：《两年来的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1925年第100期。

起的农民运动迅速开展起来。为适应这种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一些早期共产党人从改造社会的目的出发，希望文学从“吟风弄月”、“醉罢，美呀”^①的唯美派、颓废派及浪漫派中脱离出来，继续发扬“五四”时期“新青年”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功利主义和现实斗争精神，成为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为国民革命服务。

秋士（萧楚女）在《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批评了当时文坛上有些作家“遨游于高山流水之间，或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讴歌爱和美”；认为即使那些“以文学为助进社会问题解决的工具”者，也只是理论上的，形式上的，在实际生活中“仍不免是访胜，探幽，赏花，玩月！”^② 济川在给恽代英的信中，也对当时那些“歌舞升平，讲自然，谈情爱，安富尊荣不知人间有痛苦事的文学”表示不满与担忧：“我们随意翻开许多种的任何一种杂志，几乎本本有几首令人读了肉麻的、和着几篇平铺直叙不关痛痒的小说，真是令人作呕。”并提出：“现在中国急需要的，有些刺激人的猛剂，使得一般梦人醒来，使得人们静如止水的心起微微波动、此种文学作品在现时中国是急需的。”^③ 邓中夏则把文学看成是“惊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的“最有效用的工具”，因此希望“做新诗人的青年们，关于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要特别多做，惊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④。沈雁冰（茅盾）也认为：“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们去陶醉；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⑤ 因此而热切期盼文学的“大转变时期”快快到来。这批共产党人把文学看作是与革命息息相关的东西，其社会功利性得到了高度强调。能否为社会革命服务，成了他们衡量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恽代英就说：“我以为现在的新文学者若是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自然应当受一般人的尊敬；倘若这种文学终不过如八股一样无用，或者还要生些更坏的影响，我们正不必问他有什么文学上的价值，我们应

① 沈雁冰（茅盾）：《“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文学》1923年第103期。

② 秋士（萧楚女）：《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国青年》1923年第5期。

③ 《今日之文学界》（通讯），《中国青年》1923年第5期。

④ 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1923年第10期。

⑤ 沈雁冰（茅盾）：《“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文学》1923年第103期。